

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

美国第一批留学生 在北京

顾钧 著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18 使团
19 德米
20 德米
21 英日
22 英日
23 德米
24 德米
25 德米

北平
1:500

同治中兴

美国第一批留学生 在北京

顾钧 著

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 / 顾钧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347-8326-5

I. ①美… II. ①顾… III. ①留学生—人物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K83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1063 号



著名学者研究丛书
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
顾 钧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钟 骞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龙泉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新乡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中段

邮政编码 453731 电话 0373-5590988

总序一^①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②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己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代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还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的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担负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① 这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所写的总序。

②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 1 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7—8 世纪;第三次在明朝,14—15 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 世纪;第五次在五卅运动前后,20 世纪初到现在。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的、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总序二

张西平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出版已经十五年了,当年是任继愈先生写的总序,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他对“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关心和指导至今仍是我們考虑这套书的出发点。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唯有如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同时也应看到,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由苏联传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中断了,而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者中国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更为重要的在于今天中国崛起后,我们希望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如果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不这样,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好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

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呢?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列国汉学史”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基本格局尚未扭转。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的学术论争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汉学家们之间展开的。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深思,有些则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汉学家们打交道时,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

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熟悉国际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学习汉学家们的宝贵经验,理解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的同时,纠正他们中一些汉学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与其展开学术的对话。这是更新我们的学术和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面临的双重任务。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的必由之路。

国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存在,表明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海外中国学界的对话与合作,才能逐步拥有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发言权;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表达我们中国学术的理想、立场、传统与文化,才能在当下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真正重建中国当代学术体系和理论,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事业。

我们应该看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展开的,从事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主体是汉学家,由此,我们在“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再版之际对丛书做了适当的调整,本书系分为三个方面: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与研究系列。旨在介绍西方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同时展示国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涉及中国和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它们构成了西方汉学的发生和中国明清思想文化裂变的基础。这是一批具有双边文化特点的著作,是研究全球化初期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的基础。

二、国际汉学经典译丛。旨在翻译和整理西方汉学历史名著,可以说,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目前国内西方汉学早期历史的重要著作基本是我们组织翻译的。我们将继续继承这个传统,将翻译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能涵盖西方各国汉学历史的名著。

三、汉学家传记翻译与研究系列。汉学家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系统地展开对重要汉学家研究,系统整理和翻译重要汉学家的传记,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更为生动、具象的画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期盼国内外年轻的学者们加入到“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写作和翻译中来,在这里书写汉学研究的新篇章,我期待着你们。

2013年岁末于游心书屋

张西平

目 录

导言:留学生与美国专业汉学	1
---------------------	---

第一章 费正清

第一节 汉语学习	25
第二节 第一篇论文	33
第三节 与中外学人的交往	41

第二章 毕乃德

第一节 英文论文	61
第二节 《中国参考书目解题》	64

第三章 卜 德

第一节 两篇论文	80
第二节 《燕京岁时记》英译	88
第三节 《中国哲学史》英译	94
第四节 博士论文	102

第四章 顾立雅

第一节 中文论文	117
第二节 《中国之诞生》	122
第三节 与中国学人的交往	128

第五章 恒慕义

- 第一节 《古史辨》译介 139
- 第二节 与中外学人的交往 146

第六章 孙念礼

- 第一节 博士论文 153
- 第二节 葛思德图书馆 158

第七章 其他留学生

- 第一节 20 世纪 30 年代的留学生 165
- 第二节 20 世纪 40 年代的留学生 179

结语:留学生的启示 185

参考书目 189

后记 205

导言：留学生与美国专业汉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这一方面得益于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则和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的全面崛起密切相关。考察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留学北京的经历，短则 1—2 年，长则 5—6 年，有的曾多次到北京留学。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北京^①留学的一批美国学人，他们是美国最早的一批以汉学研究为留学目的的学生，他们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以及回国后的著述和活动为美国二战后的汉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到北京时间先后为序，将这批留学生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姓名	生卒年	在北京 留学时间	回国后 工作单位	学术领域和荣誉
恒慕义 (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	1924—1927	国会图书馆	中国学术史；1940—1941 年美国东方学会主席；美国远东学会（后亚洲学会）首任主席
孙念礼 (Nancy Lee Swann)	1881—1966	1925—1928	麦吉尔大学	汉史；美国首位女汉学博士

①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 年 6 月 28 日改北京为北平。（详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北京史》，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6 页。）本书的时间跨度为 1920—1950 年。为方便起见，正文中一律用“北京”，引文中用“北平”的一律保留。特此说明。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在北京 留学时间	回国后 工作单位	学术领域和荣誉
毕乃德 (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	1928—1931、 1934—1936	康乃尔大学	中国近代史;1965—1966 年美国亚洲学会主席
魏鲁男 (James R. Ware)	1901—1977	1929—1932	哈佛大学	中国哲学;《哈佛亚洲学 报》创办人
富路特 (Luther C. Goodrich)	1894—1986	1930—1932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古代史;1946—1947 年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56—1957 年美国亚洲 学会主席
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1900—1989	1930—1933、 1934—1937	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	中国边疆史
戴德华 (George E. Taylor)	1905—2000	1930—1932、 1937—1939	西雅图华盛顿 大学	中国近代史
西克曼 (Laurence Sickman)	1906—1988	1930—1935	堪萨斯纳尔逊 艺术博物馆	中国艺术史
施维许 (Earl Swisher)	1902—1975	1931—1934	科罗拉多大学	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
韦慕庭 (Clarence Martin Wilbur)	1907—1997	1931—1934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近代史;1971—1972 年美国亚洲学会主席
卜德 (Derk Bodde)	1909—2003	1931—1937	宾夕法尼亚大 学	中国哲学;1968—1969 年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85 年美国亚洲学会杰 出贡献奖
顾立雅 (Herrlee G. Creel)	1905—1994	1932—1935	芝加哥大学	中国上古史;1955—1956 年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在北京 留学时间	回国后 工作单位	学术领域和荣誉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1932—1935	哈佛大学	中国近代史; 1958—1959 年美国亚洲学会主席; 1968—1969 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凯茨 (George N. Kates)	1895—1990	1933—1941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中国艺术史
毕格 (Cyrus H. Peake)	1900—1983	1933—1934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务院	中国近代史
宾板桥 (Woodbridge Bingham)	1901—1986	1934—1937	伯克利加州大学	唐史
柯睿哲 (Edward A. Kracke)	1908—1976	1936—1940	芝加哥大学	宋史; 1972—1973 年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饶大卫 (David N. Rowe)	1905—1985	1937—1938	耶鲁大学	中国近代史、国际关系史
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	1938—1941	哈佛大学	蒙古史; 1953 年法国铭文与美文学院儒莲奖
赫芙 (Elizabeth Huff)	1912—1987	1940—1946	伯克利加州大学	伯克利东亚图书馆首任馆长
海陶玮 (James R. Hightower)	1915—2006	1940—1941、 1946—1948	哈佛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芮沃寿 (Arthur Wright)	1913—1976	1941—1947	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	中国佛教; 1964—1965 年美国亚洲学会主席
芮玛丽 (Mary C. Wright)	1917—1970	1941—1947	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	中国近代史

上表所列的这批留学生日后均成为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国(东亚)研究的开创者。其中的佼佼者曾担任美国东方学会和美国亚洲学会主席,说明其影响力已不限于中国(东亚)研究的范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4月7日成立于波士顿,乃北美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宗旨是“促进对亚洲、非洲、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学术研究”。^①1941年,为了适应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成立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该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东亚问题最重要的学术机构。远东学会开始时还和东方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如一起开年会等。后来由于远东学会的迅速发展,使其终于在1954年完全离开母体,1956年正式更名为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这两个学会是美国研究亚洲和整个东方最大和最权威的学术团体。

上表列出的学者中有三分之二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派遣来北京的。^②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最早建立的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中美之间第一个跨国学术交流机构。它的成立得益于霍尔教育基金的资助。查尔斯·霍尔(Charles M. Hall, 1863—1914)是美国铝业巨头,1914年去世后留下巨额遗产,由于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他在遗嘱中指定将其部分遗产用于资助和发展教会世俗教育事业。1924年,哈佛大学向霍尔遗产委员会申请资助,但由于不符合资助范围而遭到拒绝。后来,哈佛大学接受霍尔遗产执行人的建议,联合燕京大学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方向共同申请,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之所以选择中国文化作为研究方向,是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和部分敦煌经卷被劫夺到西方刺激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但美国在汉学研究上还是大大落后于法国等欧洲国家,因此哈佛大学希望利用这笔经费来开创汉学研究的新领域,改变哈佛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弱势地位,对于和燕京的合作很有诚意。而对于燕京大学来说,合作的愿望同样迫切。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于1919年,是一所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等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中国知识界,教会大学轻视中国文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 (1843), p. vi.

② 不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派遣的留学生只有恒慕义、孙念礼、富路特、韦慕庭、费正清、毕格、宾板桥、饶大卫。

史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这些大学迫切希望通过加强国学教育来取得中国知识界的认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876—1962)也明确意识到,加强中国学研究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取得一致立场的最佳途径,因此他极力促进与哈佛联合项目的形成。1925年9月双方达成临时协议,经过共同努力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联合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总部在哈佛,燕京大学设办事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哈佛和燕京大学按照规定开展两校间的学术合作活动,其中互派研究生及访问学者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这些当时的研究生和年轻学人后来都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名专家。哈佛燕京学社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①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燕京学社派往北京的美国留学生并不只在燕大进修,而是比较自由,可以转益多师。当然,燕京大学本来就有不少国学名师,如洪业、马鉴等,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建立国学研究所后,师资更加雄厚。该所1928年秋正式建立后,聘请陈垣为所长,顾颉刚、容庚、黄子通、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张星烺等著名学者为研究人员。虽然1931年该所解散,陈垣辞职,但顾颉刚、容庚等均留在燕京大学继续任教,他们主持编辑的《燕京学报》(1927年6月创刊)声誉日隆,成为美国留学生最常翻阅的中文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材料,本书无法对上表列出的所有留学生在北京的活动做出详细的研究。对于那些留学时间较长、著述较多的几位(费正清、毕乃德、卜德、顾立雅、恒慕义、孙念礼),本书将给予专章论述,其余将在第七章中一并论述。

二

这批留学生是美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汉学家,也可以称之为专业汉学家。在他们之前,美国汉学的主导权掌握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业余汉学家手中。

1784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Samuel Shaw,

① 由燕京大学派往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齐思和、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等。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和汉学贡献,参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文史哲》2004年第3期;陶飞亚、梁元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Earl Swishe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No. 11 (June 1942)。

1745—1794)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商人虽然很早就来到中国,但他们来去匆匆,无心他顾,中美通商 50 年后还几乎没有一个商人能懂中文,也就更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这种可悲的状况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传教士的到来才告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很少,长期生活在广州、澳门的只有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等三四个人。1842 年后美国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到 1850 年已经达到 88 人,1877 年新教入华 70 周年 (是年召开第一次新教大会) 时则达到 210 人。^① 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致力于汉语的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成为 19 世纪美国人关于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传教士主导美国的汉学研究将近一个世纪,20 世纪 20 年代后才逐渐让位给专业汉学家。

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裨治文、卫三畏的经历和学术研究,就大致可以管窥美国传教士汉学的特点。

裨治文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 1801 年生于马萨诸塞州贝勒塞屯 (Belchertown) 的一个农民家庭,1826 年毕业于安贺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此后到安道华神学院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深造。1829 年 10 月 14 日裨治文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差遣,自纽约登船远航,于 1830 年 2 月 19 日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在华 30 年的工作和生活。前 17 年他以广州、澳门为基地从事宣教和印刷出版工作,后 13 年在上海,主要工作之一是参与《圣经》的中译。1861 年裨治文在上海去世。

1829 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给这位最早的传教士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② 显然,当时的美国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写过

① S.W.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Vol.2, p.367. 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07 年来华是近代新教入华之始。

②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Boston, 1829), p.96.

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它们不仅鱼龙混杂,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提供更新和“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①于是他萌生了创办一份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英国首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一些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的支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刊物于1832年5月面世,此后每月一期,在1851年年底停刊前共出了232期。这份坚持了20年的刊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全面的研究,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刊物。裨治文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也是主笔,特别是在创办初期作者队伍比较小的情况下他的文章尤其密集,他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广州、澳门的气候》(*Climate of Canton and Macao*)、《耶稣会士提到的中国犹太人》(*Jews in China Mentioned by the Jesuits*)、《中国的印刷以及汉语学习》(*Presses in China, and Study of Chinese*)、《唐代女皇武则天的生平业绩》(*Life and Actions of Wu Tsihtien, Empress of the Tang Dynasty*)、《基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Early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into China*)等,从不同的角度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各种有关中国的信息。裨治文后来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全面系统的著作,但他在《中国丛报》上的300多篇文章已经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它们汇总起来就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小百科全书。裨治文被称为美国第一位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裨治文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是《广东方言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年在澳门印刷出版,这是美国人有史以来最早的汉语教材,也是在中国写作完成的第一本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在《广东方言读本》出版的当年(1841)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在裨治文之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也因其编写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817年。19世纪的传教士最早往往是凭借语言学的业绩而得到学界承认的。

卫三畏于1812年出生于纽约州的尤蒂卡(Utica),他的父母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1832年,纽约的长老会向广州的美部会传教站运送了一套印刷机器,并请卫三畏的父亲帮忙寻找一名年轻的印刷工,父亲立刻推荐了自己

^① E.C.Bridgman, "Introducti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1 (May, 1832), pp.1-5.